

A20/A21 北京地理·特刊之“人圈”



■ 地理档案

1941年10月4日,万余日伪军对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计划。首先在丰滦密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搞“集家并村”。日军把老百姓驱赶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1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四角建炮楼,村内驻军警,日伪称其为“部落”。由于日本侵略者把当地居民像猪、羊、牛、马等牲畜一样强行迁入,严加看管,老百姓缺少人身自由,且卫生条件极差,所以,当地百姓就气愤地将这种“部落”叫做类似猪圈、马圈、牛圈、羊圈一样的“人圈”。截至1942年底,丰滦密一、五、七、八、十二区(现密云县管辖地区)共修建了29个“部落”。“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耕作时间限制在上午10时到下午4时;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被称为“无人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李飞



蔡家甸村曾是日军在密云县划定的29处“人圈”之一。



密云县蔡家甸村,提起“人圈”,李素珍(右)和卧床不起的堂嫂任秀真(左),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当年任秀真给八路军做的鞋被日伪发现后,曾遭到残酷的毒打和审讯。



李素珍摸着家门前曾经的“人圈”围墙,她说这段围墙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坐在蔡家甸村口休息的80多岁的李大爷也住过“人圈”,至于详情,却是“记不清了”。

“人圈”里的爱恨情仇

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上午8时。东二环的早高峰正轰轰烈烈上演,车辆顺次排开缓慢前行。

此时,李成廉老人正在密云县城等待回村里的大巴车。来县城帮孙子做被子的李成廉心里挂念着老伴儿的身体,他想尽早赶回家。而在这时,密云县蔡家甸村的李素珍老人已开始收拾自己的玉米地。虽然已经81岁了,她仍然每天坚持在地里耕作,然后回家做饭、陪小狗玩。丈夫去世后,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一个人独居的生活。

李素珍穿过每天都会走几遍的水泥马路,慢慢往家走。“这些地方过去都是小土路,没现在这么宽,日本人在的时候,全都给围在圈子里。”

李成廉、李素珍,这些80多岁的蔡家甸村老人,那时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起,被日本侵略者“赶”进围墙圈起来的“部落”。羊有羊圈,猪有猪圈,村民们把这个关人的圈子称作“人圈”。

石头围墙割不断的记忆与抗争

围墙是用大石块砌起来的,最下面的石块更是硕大无比,石块间涂着水泥灰,连个缝隙都没有。一溜儿大约十几米的围墙,都是如此。李素珍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触摸这些围墙,“那

就是当年人圈的围墙啊,这一段围墙跟过去一模一样。”

李素珍家的院子很漂亮。杏树、梨树、李树,一字排开,开着花,一岁多的小狗“小不点”围着李素珍转来转去。李素珍打开院门,一米开外处的石头围墙,那里曾有她一辈子忘不掉的爱恨和恐怖记忆。日伪时期,13岁的童养媳李素珍全家就住在里面。那时,蔡家甸和附近几个村落的老百姓都被集中在这里,李素珍家二十几口人挤在5间房里。

密云县委党史办调研员林振洪介绍,日伪修建“人圈”,目的是要确保伪满政权的安全,同时要隔断共产党、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各种联系,让八路军难以生存。但是,在所有建造“人圈”的地区,都有老百姓以死抗争不进“人圈”,也有很多百姓在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八路军。

李素珍的家在全村最老的一栋房子后面,原来的三小间厢房早已经拆掉了,正房住着李素珍的大堂嫂任秀真。在“人圈”时期,她俩们常常聚在一起偷偷为八路军做鞋袜。

父不知子,子不知父

任秀真的得救还要感谢村里的“两面派”保长——李钧,村民们说他是个“两面派”,那是打心眼儿里崇敬;他白天装作给日本人办事,而他真正的身份却是地下党。李钧通过疏通关系、请客送礼,从日本人手里救了不少乡亲

和地下党。李钧的儿子李成廉如今已经84岁,身子骨硬朗,也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即便在被关在“人圈”的日子里,他也断断续续跑到山沟里去上课。

李成廉的家背靠一条小河流,村里最古老的已经有300年历史的房子也是他家的。李成廉跟很多村里人不一样,他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中山装、布鞋,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走在村子里,很有精神。

“人圈”时代,15岁的李成廉是个活泼、大胆的少年。“1944年,胜利在眼前”、“日本缺人缺物,好比灯里缺了油”、“柏林被炸如大海,东京也怕飞机来”——这些秘密教材上的课文,李成廉至今记忆犹新。

那些偷偷上课的晚上,老师李振宸就会拿着课本在后山沟等着这几名好学好动的学生。“父母都不知道我晚上偷偷溜出去是上课去的,这些事情要瞒着人。”就像李成廉当年并不知道父亲李钧是地下党一样,李钧对儿子偷着上课的事情也毫不知情。

由于该地区的人圈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原计划的四个门只修了一个,也就是说,蔡家甸的“人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封闭,这就给求知欲强的孩子们提供了偷跑出去上学的机会。

中午,李成廉回到家里,儿媳妇和老伴儿正等着他吃饭。有人说,别看现在家里平常只有四口人,可一到过年过节,老哥几个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有30多口人呢,吃饭得坐两桌”。

■ 专家

日军“人圈”罪行堪比南京大屠杀

●罗存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人圈”,是老百姓自己的叫法,表达了对日军强烈的憎恨。“人圈”在北京的密云、怀柔、延庆和平谷都曾经出现过。可以说,“人圈”是北京地区老百姓在日本侵华时期受到的最无人道的虐待之一。大量老百姓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没有生活来源。在“人圈”里,很多人家挤在一起,“集家并村”,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饿死冻死,还有人被迫做工。日军建据点让当地老百姓无偿劳动,没有任何工资,常毒打他们,甚至还让老百姓互相对打。

有很多人不堪忍受折磨,参加了八路军。我曾采访过延庆的李全福老人,十几岁时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折磨投靠了八路军。一年多以后,不幸被俘,被抓到北海道去当劳工,1945年抗战胜利才回国。跟李全福一起参军的还有其他不少同村人,其中有10个人被俘,两个人死在日本。这种情况很普遍,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对西方的“二战”集中营都有了解,但是对于罪行堪比南京大屠杀的“人圈”还了解不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北京地区的“人圈”状况没有河北地区那么严重,但也达到了让人震惊、令人发指的地步。

目前,抗战馆已经在密云和延庆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对幸存者进行录音录像采访。接下来,我们还将抓紧时间对北京地区的所有“人圈”进行详细的调查,弄清楚日伪在“无人区”和“人圈”里的暴行,建立相关的历史研究档案。



►密云县新城子村的“九楼十八杈”是北京树龄最长的古柏之一。清明前后,村里人在树上系了很多红丝带,寄托哀思并祈祷平安。



►抗战时期,日军在长城沿线设置了大量“部落”,将百姓驱赶到指定村庄居住,严密管制。当地百姓称之为“人圈”。

■ “人圈”名录

蔡家甸、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东湾子、西湾子、番字牌、司营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仓峪、下仓峪、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关、小西天、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窝铺、下窝铺、忙牛沟、火石岭……(仅限丰滦密一、五、七、八、十二区,现密云县管辖地区。目录截至1942年底)

■ 记者手记

无畏的选择 平凡的崇敬

原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段叔生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抗日战争史研究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开篇第一句话,“第一点:我们要写‘无人区’的斗争”。

西方有集中营,东方有“无人区”,老百姓被赶进“人圈”,过着像牲畜一样的日子,而原本热闹的家园变成冰冷、恐怖的无人区。在采访中,面对与“人圈”的受害者交流,听他们回忆过去,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残酷的经历,也是一个珍贵的经历。

“人圈”留给我们的有形之物实在不多,在密云新城子镇蔡家甸村,只有一段十几米的围墙,是过去“人圈”的遗迹,这段围墙,已经被当地村民原地利用成自家的院墙。据密云县委党史办调研员林振洪介绍,像这样的围墙,在密云境内,也是少之又少。要想深入了解、挖掘和研究“人圈”的故事,只能从人圈的亲历者入手。

这些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在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虐待并没有全部写在脸上。李素珍老人,穿着红色的毛衣,与小狗“小不点”有说有笑,对她而言,现在最大的烦恼莫过于房子有点漏雨、放假的时候孩子能不能在家多住几天。两年的“人圈”生涯,李素珍觉得此后的人生再也没有那么难、那么让人害怕的事情。

初入蔡家甸,感觉这里与无数的村庄一样,有一种安静、琐碎、闲适、亲切的生活氛围,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蔡家村的深处,又有一种感动和崇敬油然而生,这是对最平凡者热爱生活的感动,也是对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无畏选择的崇敬。这些普通的村民,在“人圈”里,往往一家人才有一件完整的衣服,甚至于,有的人在邻居到访时,让没有衣服穿的家人跳进坑里避免尴尬。但是,也正是他们,会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布头拼凑下来,留着给八路军做鞋袜。

受访者回忆,日本投降之后,村民们大多回到了自己原本的家园,把拆掉、烧光的房屋重新盖起来,开始新的生活。也有的人,在原住所附近,另起生活的炉灶。文章中所采访的李素珍,也在1945年穿上了大红色的嫁衣,正式成为了一个新媳妇。